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广东南路农民运动概述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广东南路，包括当时广东省直接管辖(现在分属广东、广西二省区)的 15 县 2 市 阳江县、阳春县、茂名县、信宜县、电白县、化县、吴川县、廉江县、海康县、徐闻县、遂溪县、合浦县、灵山县、钦县、防城县和梅菪市、北海市。南路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长期以来遭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地主土豪、军阀土匪的多重压迫与剥削，社会矛盾激化，只要一点星火，即可造成革命的燎原之势。

1921 年前后，南路各县的进步青年黄学增、韩盈、邵贞昌、谭作舟等人，陆续到广州求学，寻求革命真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南路著名的农民运动领导人。1924 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改组国民党，形成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为广东革命包括农民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工作的党员，建议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干部。8 月，黄学增在第一届农讲所结业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到各地组织发动农民运动的同时，积极推荐南路进步青年到农讲所学习。先后有 20 人在 2—5 届农讲所结业，大部分被

派遣回到南路，成为南路革命的先驱和农民运动的骨干，在蓬勃发展的广东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农民运动为中心的革命斗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东南路农民运动的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一、秘密发动时期(1924 年 11 月—1925 年 10 月)

1924 年 11 月，第二届农讲所学员黄杰、陈钧达受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遣返雷州。当时统治着雷州的军阀邓本殷正与土豪劣绅强迫农民弃水稻种植鸦片，海康县一、四、六各区农民对此强烈不满。黄杰等即发动农民进行抵制，同时在一、四、六区的 41 个乡秘密成立了农民协会。县长陈炳焱发觉此事，声言要扣押“运动农民者”。农会活动受阻，黄杰、陈钧达被迫暂时隐蔽。1925 年夏，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派遣韩盈回遂溪，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后与 7—9 月间回雷州的第三、四届农讲所学员黄广渊、苏天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薛文藻等，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雷州特别支部（秘密简称“雷枝”），选韩盈任书记，组织雷州青年同志社、乐民分社和纪家分社，吸收社员 100 多人，分赴各乡开展农民运动，在遂溪县第六区（乐民）秘密成立了雷州最早的 5 个乡农民协会，还建立了农民自卫军（时称“联乡武装预备队”），有队员 70 多人。与此同时，在广州求学的谭作舟、敖华裘、黄贞恒等，利用暑假回阳江，在第二区雅韶乡秘密成立了阳江县第一个农民协会；电白旅穗学生邵贞昌、区就宪等也回乡秘密传播革命思想，发动莘坡乡近千农民准备成立农会。在国民革命军南讨之前，处于萌发时期秘密阶段的南路农民运动，虽因阻力重重，未能大规模的发动和进行有成效的斗争，但它是南路农民运

动的先声，它的活动扰乱了军阀的后方，配合了国民革命军南讨，为南路农运的发展作了准备。

二、公开发动时期(1925 年 11 月—1926 年 2 月)

1925 年 10 月下旬，国民政府出师南讨，12 月，克复两阳、高、雷、钦、廉。南讨的胜利，实现了广东统一，为南路农运的公开发动提供了条件。

南讨开始时，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南路特别委员会成员随军南进，在梅菪设署办公。该会是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党员比重很大，主席潘兆奎、委员黄学增、彭刚侠、林丛郁，工作人员韩盈、钟竹筠、薛文藻、杨枝水、陈克醒等，都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南路特别委员会向各县派出党务筹备员（其中也有共产党员），建立和改组国民党组织，贯彻“三大政策”和开展农工运动。与此同时，中共广东区委、团广东区委、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在广州的一些进步团体，陆续派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农民运动特派员和进步青年来到南路，开展以农民运动为中心的革命运动。

雷州克复前后，“雷枝”转为公开活动，1925 年 10 月下旬，在遂溪乐民公开召集各乡农民开会，选出了各乡农民协会职员，设立办事处。雷州青年同志社成员组织演讲队，深入各乡宣传，“诉说农民之痛苦，指出只有组织农民协会才是解救的办法”。雷枝还从当地人民利益出发，发表《对雷州善后宣言》，提出铲除贪官污吏、肃清散兵土匪等 11 项最低要求，并多次向共青团广东区委建议采取措施防止土豪劣绅和政客乘机执掌雷州各县行政权。在此形势下，过去饱受地主、民团、贪官污吏压榨的南路农民，纷纷起来成立农民协会，进行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

1926年2月5日,遂溪县第二区农民包围界炮墟民团局,痛打局长杨文川。同月,2000多名农民集会遂溪县城游行示威,要求减免煤油捐和猪捐、牛捐,县长伍横贯被迫表态承诺。

海康县在1925年12月就成立了县农协筹备会,并与“除暴安良会”配合,惩办地主土豪和反动民团团长,推动了各区农民协会的成立。在农民运动特派员的发动下,阳江、电白、化县、茂名、廉江、信宜、合浦、防城各县农民运动,也陆续开展起来。在这个时期,遂溪县的一、二、四、六、七区,先后有30多个乡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约1500人。

三、发展时期(1926年3月—1926年12月)

1926年3月7日,以中共广东区委南路特派员黄学增为主任的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以下简称南路办事处)在梅菪成立,与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合署办公。办事处根据南路农工运动干部缺乏的情况,开办了“梅菪市宣传学校”“雷州宣传讲习所”和“雷州工农补习班”,培训干部150多人。还要求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和派驻各县的农民运动特派员进行社会调查,由黄学增执笔写成长达3万多字的《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的调查报告,总结南路早期农运情况,提出具体办法,指导南路农运的发展。

为保证农会组织的纯洁,办事处曾严格要求各地按照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农民协会章程》组织农会。茂名县按章改组了茂南区的“生理会”;化县取缔了小地主陈瑞芝组织的假农会;海康县对利用宗族关系混入肇榄乡农民协会并担任委员长的地主卓子藩,则开除会籍,免去职务。

针对当时农民缺乏组织纪律观念而产生的不良倾向,南路办事处加强了对农会和会员的政治教育与纪律训练,严肃

批评了遂溪县第六区农民协会“违背定章，干涉行政及种种并髦法纪的非法行为”；及时制止了海康县六、四两区农民自卫军之间出于宗族意识的无意义之争，加强了农民协会之间的团结。办事处还通过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对各县党部发布命令，打击破坏农运的反动势力，扶植农民运动。1926年3、4月间，先后挫败了遂溪三区土豪王庆云等破坏农运的阴谋；揭露了海康洪钟鏊组织“雷州革命同志社”对抗和污蔑农民运动的行为；严惩了攻击和破坏农民运动的电白县第三区民团团董李公禄。鉴于当时地主民团破坏农运的事件在南路时有发生，办事处专门发了布告，揭露土劣的种种阴谋手段，教育农民团结一致，冲破阻力前进。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南路是不公开的，党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大多数以农运特派员、国民党党部筹备员、农民协会职员的身份分散在各县工作。身兼中共广东区委南路特派员、省农协南路办事处主任、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委员（后任主席）三职的黄学增，较好地利用了当时统一战线采取党内合作形式这一有利条件，把共产党员安排到各机关和农民团体中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推动了农运高潮的到来，同时发展了中共组织。1926年春夏间，阳江、吴川、梅菪、遂溪、海康、廉江、茂名、北海等地，先后建立起党的支部或小组，在实际上领导了当地各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26年3月15日，吴川县第五区（振文）四十八乡农民代表500多人，在农会领导人李士芬率领下，开展反对苛抽捐税（反“三捐”，即反收蒜头捐、蒜串捐、壳灰捐）的群众斗争并取得胜利，吴川和南路农民深感团结的力量，纷纷起而组织农

民协会。至 4 月,遂溪县 10 个区已有 7 个区成立农民协会,会员 2800 多人,农民自卫军拥有各类枪支 700 多支。海康县 8 个区已有 6 个区 66 个乡成立农会,会员 2900 多人。这两个县率先于 4 月 15 日、17 日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发表联合宣言,号召农民同工人、革命军人、觉悟学生和其他一切革命分子联合起来;“猛烈地向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番鬼佬)及其工具军阀(带兵老爷)等一切反革命派进攻。”在此期间,各地农民在各级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反抗民团欺压,收缴民团枪支,协助肃清土匪;“雷州匪首几完全击毙”,雷州匪患一度绝迹。

常得省港风气之先的阳江县,在南讨开始前后已有农运特派员何毅、欧赤和农讲所第 5 届学员谭作舟、吴铎民等在那里活动。南路克复后,农运公开发展,到 1926 年 4 月,一、二、四区相继成立区、乡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军,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阳江县农协筹备会。农运特派员周永杰在廉江县组建了县农协筹备处,在角湖垌成立了该县第一个乡农民协会,接着,一、三区各乡农民协会相继成立,有会员 500 多人。农运特派员卢宝炫在化县得到国民党左派力量的支持,发动农民打击地主劣绅,取缔假农会,首先在第四区尖岗乡成立了该县第一个农会,会员 340 多人,接着,一、四、五、六区的 30 多个乡农会相继成立。

1926 年 5 月 1 日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有力地推动了南路农民运动的发展。在会后短期内,农民运动迅速扩大到整个南路地区。到 8 月上旬,继遂溪、海康之后,电白、廉江、化县陆续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其余的县也成立了许多区、乡农民协会。在南路办事处迁往高州之前,全路农会会员已从 1 万人左右发展到 5 万多人。南路农民在各级农会的

带领下,反对苛捐杂税,取消田主苛例,拒交“批头金”“田信鸡”“田信鸭”,拒绝夺佃,一些地方还提出了减租要求。农民协会积极参与社会上的重大政治斗争活动,农民自卫军协助政府肃清土匪、维持社会治安,甚至连拐卖妇女、偷拆邮件等类问题,也都由农民协会出面处理,农民协会“事实上都是变成农民第二个政府”。^①农民协会还与当地工人、妇女、青年、学生、商人等群众团体互相支持,共同对敌,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省港罢工和争取民主权利、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显示了农民、工人和各界群众团结战斗的力量。

1926年8月,南路办事处和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由梅菴迁往高州城。

当时,随着国内革命的深入发展,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以国民党右派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在广东掀起了反对农民运动的逆流。在严重的形势面前,南路农运的领导者们,严肃批评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倾向,并决定把南路办事处迁到农运尚未普遍开展的高州,开辟工作面,迎接激烈的斗争。

早在1926年6—8月初,电白县就连续发生了地主民团包围农会、劫掠农户、捕禁吊打农运积极分子多起事件。土劣们秘密组织“八堡会”,叫喊要“使农民协会永远不发生于电白境内”,电白县署也建立“联团”,支持土劣与农民协会对抗。为了揭露电白县地主土豪和民团摧残农民运动的事实真相,黄学增带领农运特派员深入电白农村调查,写出了《为电白农民求救》一文,载于报刊,并于8月17日在广州召开的省农协执

^①黄学增:《五卅运动后广东农民运动的状况》,载《红旗》第15期,1929年5月。

委扩大会议上,就‘电白事件’提出了惩办土豪劣绅、解散不法民团和‘八堡会’取消苛捐杂税、赔偿农民损失等要求。出席会议的代表和广州郊区农民 1000 多人,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严惩摧残农运的地主豪绅、右派官吏和不法军人,保护农民运动的发展。9 月 10 日,海康县又发生了震动全省的农运特派员程庚被杀事件。县长苏民、驻防军营长陈公侠与劣绅邓志圣勾结,诬程庚‘引匪、济匪’,将程庚逮捕枪杀。接着又借口北伐发布所谓维持治安的《重要通告》,以压制农运。海康群众极为愤慨,保存程庚遗体,决心为程庚报仇。南路办事处坚决支持海康县农民协会和各群众社团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愿,提出撤办苏民、陈公侠,缉办邓志圣,抚恤程庚家属等要求;调集遂溪县第六区农民自卫军到遂、海边界集结,防止事态扩大。通过《中国农民》、《广州民国日报》、《工人之路》披露事件真相,指斥国民党右派的罪行。

1926 年 9 月上旬,国民党南路党部大会在高州召开,同时召开南路农民、工人代表大会。会议决定以高州六属为重点,大规模地发动农运,反击反动势力的破坏。

高州六属当时包括茂名、信宜、化县、电白、吴川、廉江 6 县。办事处迁往高州时,正是广东农运遇到严重困难之时。办事处一方面态度鲜明地批评、揭露国民党内忽视以至摧残农民运动的倾向和表现,另一方面则认真加强对高州六属农民运动的指导和发动。办事处人员经常深入各县农村,并发动当地青年、学生社团,广泛宣传,组织农会,开展斗争。黄学增还根据中共广东区委“要把党的基层建筑在乡农民协会上面”^①

^①罗绮园：《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后广东农运情形》。

和通过训练班‘找同志’的指示,开办了“高州农民干部训练学校”,开设农运干部短期训练班,招收高州六属农运积极分子参加学习,从中吸收共产党员,使之成为各县农运的骨干力量。由于南路办事处的有效努力,高州各县农民运动在短期内迅速发展起来。茂名县东南西北四个大区的几十个区、乡很快成立了农民协会,在反对地主土豪的斗争中取得节节胜利。信宜县 7 个乡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 1400 多人。高州的茂名、信宜一隅农运沉寂的局面逐渐打开。

1926 年夏秋间,阳江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以“农村民团武器是公营和农民被迫捐款购买”为理由,通过国民党阳江县党部和县署,将部分枪支交给各乡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到是年 11 月阳江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时,全县已有 80 多个乡农民协会,会员 12000 多人,农民自卫军拥有枪支 800 余杆。

在这一阶段,除原有的遂溪、海康、电白、廉江、化县之外,又有阳江、防城成立了县农民协会,茂名县农协也在积极筹备正式成立;继吴川县之后,信宜、阳春也成立了县农协筹备委员会。偏远的北海、合浦、灵山、钦县的农民运动亦有所发展。全路农民协会会员从夏天的 5 万人猛增到 12 万人^①。北伐开始后,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已向湖南、湖北等省转移,广东农民运动从整体看,已处于停滞阶段,而在共产党员的努力和南路办事处的指导下,南路农民运动仍然出现一个继续发展的阶段,这在当时广东是较为特殊的现象。

四、困难至失败时期(1927 年 1 月—1927 年 7 月)

^① 此为南路各县党史研究室初期编写的《革命斗争大事记》的统计数字,据陈信材的回忆则为 40 万人。

1927 年 1 月，中共广东南路地方委员会成立，以黄学增为书记。南路地委加强了对各县人民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领导，并在廉江、电白、化县发展基层组织。但由于广东的革命形势已停滞不前，南路地委的努力收效甚微，未能有力地粉碎国民党右派势力日益公开化的反革命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南路农民运动已面临重重困难和被镇压的局面。

1927 年 2 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作出‘改组全省各县、市党部’的决定，派林云陔为高雷党务视察员坐镇高州，开始‘清党’。南路各县国民党右派头面人物随即与当地反动势力和驻防军勾结，操纵选举，排挤左派和共产党员，破坏农工运动。3 月，阳江县蛋场乡驻防军纵容民团枪杀该乡农协委员林星慈，海康县长谢莲航和驻军营长温钟声公开逮捕农协干部，枪杀县农会执委陈凤鸣夫妇和阮永英，各地连续发生收缴农民自卫军枪支，解散区、乡农会，杀害农会领导人的事件，而且越演越烈。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 月 15 日，广东反动派步其后尘，白色恐怖笼罩广东各地。早有预谋的南路反动派立即动手对共产党员、农会干部和革命群众大逮捕大屠杀。4 月 16 日，阳江县敖昌骥、谭作舟、黄贞恒等中共党员和工农运动领导人 30 多人被捕，16 人被解押广州，其中 15 人被杀害；18 日，省农协南路办事处所在地高州南皋书院被包围，一批农协代表和进步学生被捕；同日，化县农运积极分子和进步学生被捕；20 日，驻梅菪的余汉谋团到电白县搜捕中共党员、农运骨干 100 多人；23 日，北海市中共主要领导人江刺横、李鸿飞等 7 人被捕，下旬，中共遂溪县组织被破坏，主要领导人颜卓、邓成球、陈克醒、金美荣等 15 人被捕，南路革

命最早领导人之一韩盈遭杀害。5月初,南路办事处委员梁本荣在阳江被捕。各级农民协会被解散,不少村庄被烧毁,革命人民遭受巨大损失。但是,革命并未被扑灭,人民也未屈服。

在反革命事变发生前夕,中共吴川支部得到内线密报,通知吴川、梅菪、化县、茂名等地党组织迅速转移,这些地方的党组织因而没有遭到大的破坏,保存了南路人民武装反抗的一部分领导力量。各地农会组织虽被迫解散,但散居在广大乡村、受过农运锻炼的农会干部、10多万会员和成百上千的农民自卫军,仍是一支强大的力量。5月上旬,由朱也赤、陈信材主持,在广州湾秘密召开了南路十五县农民代表会议,讨论应变措施,成立“南路农民革命委员会”,选举朱也赤、陈信材为主任,决定与会同志分赴各地,集结力量,发动农民暴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保卫农民革命成果。不久,中共广东省委派彭中英回南路,主持成立中共广东南路特委,领导农民斗争。

1927年5月至1928年初,在南路农民革命委员会和中共南路特委的领导下,遂溪、海康、吴川、廉江、化县、信宜、茂名先后爆发了以农民为基本队伍的武装暴动。1927年5月14日,黄广渊、陈光礼等在遂溪县乐民、海山发动了震动南路的农军武装暴动,受挫后,余部100多人撤退到北部湾上的斜阳岛,改造土匪,扩充队伍,开荒生产,多次回师攻打遂溪,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海岛游击战斗长达5年之久,直到1932年底才被镇压下去。^①与遂溪乐民、海山暴动同时,黄杰、陈育才在海康县第七区东海仔组织农军100多人举行暴动,收缴

^①详情见《斜阳浴血》,刊《广东党史资料》第2辑。

反动民团武装,劫持海上哨船,计划与遂溪农军汇合,在途中遭敌人伏击,农军被打散,陈育才和黄杰先后牺牲。1927年5月至9月,李士芬、陈信材等以吴川振文农军为基础,组成“吴梅农民自卫军”100多人,活跃于鉴江下游的吴川斗门、山墟一带,伺机打击国民党邱兆琛团,后因敌强我弱而失败,李士芬被捕牺牲。1927年7月31日,廉江县农军300多人在周永杰、梁安成、刘帮武等领导下集结梧村垌举行武装暴动,成立“廉江县工农革命委员会”和“廉江县工农革命军”,与敌激战3天,暴动失败,坚守碉楼的13名勇士被杀害,农军大部转入地下斗争。1927年11月,化县农民协会组织农军80多人,誓师北上,参加广州起义,途经阳江县境时被敌人堵截包围、打散。12月15日,朱也赤、罗克明、陈叶之等组织了信宜怀乡暴动;1928年3月22日,周军载、李雅度、李淑明等组织了茂名沙田暴动,但都失败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东南路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的、自觉的农民革命运动,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从1924年至1925年,中共广东区委陆续派遣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回南路,建立由党、团员组成的特别支部及其外围组织青年同志社。1926年春夏间,在南路多数县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或小组。这些党团组织,是南路农民运动的领导核心。当时,南路农运指导机关——广东省农协南路办事处的领导成员,各级农民运动特派员、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南路特别委员会的委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他们以秘密的、公开的、合法的身份,在南路农民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实际的领导作用。正如当时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农委书记的罗绮园在《广东农民运动报告》中所说:“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特

派员，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们的同志，我们实际做了农民运动，把名誉送给国民党，可以说我们是成功不居。若是我们不去做农民运动，所谓农民协会不知现在还在什么地方。”中国共产党南路地方组织在领导农民运动时，注意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政治教育和纪律训练，积极组织农民参与社会上的重大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帮助农民从小生产的狭小天地里逐步解放出来，把自身的解放同民族的阶级的解放联系起来，同其他阶级、阶层的斗争联系起来。这种阶级的、政治的觉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区别于我国历史上的单纯农民运动或农民战争的重要标志。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东南路农民运动，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在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发展起来的。当时农民决议案的制订、农运干部的培训和派遣、农民协会组建和审批、农民和地主土豪之间矛盾的处理等等，一般都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在南路则是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南路特别委员会）进行的。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的国民党，曾在南路农民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这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

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广东南路农民运动也有不足和失误。在领导农民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时候，较为忽略引导农民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在早期发动和批准成立各级农会问题上，强调纪律和按章办事的同时，出现了繁琐的手续和过分的限制，束缚了刚刚发动起来的农民运动；在建立农民武装——农民自卫军的问题上，未能足够重视，而且目的不够明确，许多区、乡的农民自卫军人数少、装备差、训练不足，无力对反动势力和反动武装进行沉重的打击，在反动势力反扑的时候，自

已立即处于劣势，终至革命成果丢失，运动陷于失败。这些不足和失误，产生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之下，在当时广东亦非南路所独有，但仍是值得吸取的深刻教训。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东南路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南路地区首次伟大的革命实践之一部分，它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支持了统一广东、省港罢工和北伐战争，传播了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锻炼了广大农民群众，培养了革命干部，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教训，为南路革命斗争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阮应祺 邓荣诗执笔）

历史文献

雷州特支关于第二次 临时会议情况的报告^{*}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十四、十一、卅日〔即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卅日〕第二次临时会议到会者 文藻、广渊、天春、寒萤^①。

（一）报告：

a. 寒萤——（A）本支自开成立会后，各同志俱分散各方去，因为当时环境的关系，各同志没有报告到支部，故支部亦无甚材料可报告区委。但在那时——正是陈学谈勾结法帝国主义者拘捕我们同志最厉害的时期，我处于那种环境底下，时有可危之势，故不能对区委多作报告，盖恐邮政失漏机密也。在革命军克复遂溪城之次日，始接到区委之一四二七号通告，及代表大会决议案，反基〔督〕宣传大纲，十月革命八周年纪念等件，想邮政如此迟延，必因受战事影响，轮船不通之故。且第三号通告没有接到，亦系邮失。照看区委之各号通告，我们已有违背命令之可嫌。支部不能时常开会，多因各同志经济困难，来往路费无着，对于区委之各种决议及通告，我们多有不能立刻执行者。还有人才缺乏或经济困难，机会未到之故。

^{*} “雷州特支”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雷州特别支部。标题是档案部门拟的。
^① 即韩盈。